

重返历史现场中的集体记忆构建

——评陈启文长篇报告文学《大河上下》

荀利波

(曲靖师范学院 中文系, 云南 曲靖 655011)

[摘要] 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上下》以玛多、刘家峡、三门峡、花园口等对黄河有着特殊意义的点勾勒了黄河的整体图景,并通过实地采访、历史档案资料查阅等方式,整合了千百年来华夏文明中黄河的琐碎片段,立体化地呈现出黄河的历史情态,为黄河立传、写史,构建黄河的集体记忆,在功与过、是与非、天灾与人祸的比较性叙述中,为黄河的命运乃至中华文明的命运发出悲情呐喊。

[关键词] 《大河上下》; 历史现场; 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 I2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6)06-0007-05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Comments on Chen Qiwen's Long Report Literature *Down the Yellow River*

XUN Lib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 Qujing, Yunnan 655011 China)

Abstract: Chen Qiwen's reportage *Down the Yellow River* draws the outline of the overall picture of the *Yellow River* by describing such typical scenic spots of the river as Maduo, Liujiaxia, Sanmenxia and Huayuankou, and integrates the trivial fragments of the thousands-of-year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through field interviews and archival data access, which three-dimensionally shows the history modal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construct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Yellow River by writing biography and history for i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narration of merits and demerits, right and wrong, natural disasters and man-made calamities, the book makes a sad cry for the fate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even the fate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Down the Yellow River*; historical scene; collective memory

新世纪以来,一些评论认为:“权力的‘招安’与利益的诱惑,使报告文学的批判品格出现弱化与退化”^[1],这或许是存在的,而且不只是报告文学,其他文学样式同样有着这样的问题。但是,也有一大批作家,始终秉持作家的使命意识,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借助文学书写现实世界中的真善美、假丑恶,表达自己对人类社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刻

思考,展现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与思考。

陈启文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一直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中国大地,紧贴时代脉搏,叩问社会病症,在文学的园地里笔耕不辍,收获了《共和国粮食报告》《南方冰雪报告》《问卜洞庭》《命脉——中国水利调查》《马家窑调查》《北京风暴》《呼伦贝尔的

收稿日期: 2016-10-18

基金项目: 广州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博士学术团队项目“生态灾害与中国当代文学书写”(201404XSTD)

作者简介: 荀利波(1982-),男,云南曲靖人,曲靖师范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艺术和云南地方文化。

忧伤》《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跨越时空的透视》《湘江,谁为你哭泣》《由远及近的黄河》《江州义门》《河床》《洗脚》《短暂的远航》《梦魇》《季节深处》《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港澳往事:繁华背后不得不说的秘密》《天命如水》等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小说和散文。特别是在报告文学创作中,陈启文用力最深,先后创作了一大批有较高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又尤以水安全及其生态问题的深度探寻独树一帜,形成了《问卜洞庭》《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湘江,谁为你哭泣》《由远及近的黄河》等作品,《大河上下》是其继《命脉——中国水利调查》中对黄河描述的再度叙述,但又并非是简单的重述,而是高扬理性的旗帜,通过对事实的科学调查,重返历史现场,为黄河立传、写史,系统构建华夏民族对黄河的集体记忆,着眼水生态安全的长远大局,在功与过、是与非、天灾与人祸的比较性叙述中,为黄河的命运,乃至中华文明的命运发出悲情呐喊,以此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科学、历史和文学的意义与价值。

一 黄河图景的整体构拟

以点带面、绘制黄河图景是陈启文在处理黄河构图、呈现报告现场时采取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处理,为整个作品叙述格局的建构提供了可能。陈启文《大河上下》要为黄河立传、写史,但他所选取的对象显然会给写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更不要说如何显现其创作意图。因为黄河不仅“百川交集、万溪汇聚”,干流全长约5464公里,流域面积约79.5万平方公里,而且在黄河生成和滚滚流淌的漫漫历史中,造就了华夏民族与上下五千年华夏文明。如此漫长、庞大的一个对象,何以恰当而又真实地呈现,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算客观,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读者透过文字的阅读看到大河的画面,特别是,如何把一条牵动华夏数千年文明并已在华夏子孙心中印刻下“母亲河”感性印象的大河重新建构起理性的认识,这些问题很显然在写作之初就摆放在了陈启文的面前。

很显然,作为一个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文体创作经验丰富、始终植根社会问题之中的作家,习惯了纷繁芜杂、关系错综的各类现象,且对中国水利状况有着丰富阅历,陈启文在对黄河这一对象的

呈现方式上也颇为自信,在《大河上下》的写作中,他延续了惯常的写作方式,秉持着对事实的客观呈现,但这种呈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从“十分恶劣”的玛多到刘家峡、黄河铁桥、晋陕大峡谷、壶口、三门峡、小浪底、桃花峪、垦利河口、东平湖、沂口,直入黄河入海处,将黄河铺陈开来,一路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黄河的长与宽。这些“点”的选取,并非随意而为。他在《大河上下》的引子里有这样一句话:“看见她,你就能真正看见一条大河了。”^{[2]19}我把这句话中的“她”理解为整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黄河——由外到内、由过去到现在,以及与黄河相关的人和事,以一种有序的、立体的方式,向我们绘制了一个站立起来的黄河姿态。

作品整体叙述顺序上选择的是溯流而下,一开始就带我们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地方玛多——那里是去往黄河源头无法绕开的地方,是一个一年只有冷暖两季并且长达八个月都是冰天雪地的地方,那里仿佛是世界的尽头。陈启文在作品中写道:“有人说,社会上最艰苦的行业之一是水利,水利行业最艰苦的地方在黄河,黄河上最艰苦的工作是水文,水文最艰苦的是上游,上游最艰苦的地方在源区,源区最艰苦的地方在玛多”,^{[2]10}从玛多陈启文开启了对黄河的立传和写史之路,我们在这里感受到的并非黄河如母亲般的慈祥、和蔼,而是冰冷和死亡,是水文人在这里坚守的艰苦。这种艰苦令我震撼,而这种震撼来自于作者亲身的体验:

如果说玛多给我留下了什么记忆,我只能说,这是一个让我一阵一阵颤抖的地方,一个让我头疼欲裂的地方。我实在不甘心用“恶劣”甚至“十分恶劣”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里的自然环境,但对于人类,这儿又的确是生存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2]9}

我在县城玛查里留宿的那个风雨交加之夜,终于体验到了什么是高寒缺氧,每一次呼吸都牵扯得神经一阵阵疼痛,冷得连棉被也裹不住瑟瑟发抖的身子骨……这就是我用短暂的一天一夜体验到的玛多,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2]10}

如果一个人将要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来体验这一切,那又该是怎样铭心蚀骨的记忆?在这如人间绝域的地方,又是什么在如此深深地吸引他?如果说神秘的黄河源让我充满了无穷的想象,一个人的

内心也许比黄河源更神秘。^{[2]10}

这样的—个开始,似乎预示着黄河命运多舛、孕育华夏民族与华夏文明的不易——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黄河治理、黄河的七次大改道、花园口黄河的决堤与大面积泛滥,给华夏民族带来无数次痛苦记忆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片片广袤的华夏沃土。同时,也开启了我们对于黄河重新认识的探秘之旅。当然,同时掀开的还有被黄河掀起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接下来的每一个点的选取,同样显得十分讲究,刘家峡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大型水利工程,它坎坷艰难而曲折的修建历程是一部浓缩了的新中国水利史;1909年七月初四竣工通行的黄河铁桥,不仅是黄河上的第一座桥,而且以其沧桑的经历而成为见证黄河桥梁史的活化石;再到河口镇、壶口瀑布、三门峡、小浪底、沁河、桃花峪、花园口、大汶河、东平湖、涑口、利津等,一道道关口、一次次曲折回转,从上游溯流而下,形象地将九曲黄河的整体形态绘制出来,唤醒了深埋于华夏文化历史长河之中的黄河记忆。

当然,这也是整部作品构建集体记忆的重要基点。集体记忆就是“记忆的集体维度,首先表现为记忆书写的叙述框架总是具有哪怕最低程度的集体性”,^[3]它需要被唤起、叙述、重建,甚至于进行规范,而《大河上下》就是通过这样的叙述,试图唤起和重建华夏民族对黄河的集体记忆。同时,从创作角度而言,如果将整部作品看作一个有生命的个体,那么,以点带面、重点突破所构拟的黄河整体图景,搭建起了整部作品叙述格局中的核心框架,呈现出从客观到主观、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到人的独特的报告文学叙述样式,增强了反映和批判现实的力度。

二 历史情态的多视角叙述

读完《大河上下》,许多历史中的零星记忆随便被奔流的黄河一路串联了起来,这种记忆并非属于某个阅读者的个体感受,而是潜隐于整个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成为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也不仅是关于黄河才有,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每一个构成因子,但《大河上下》却因此有了一种对集体记忆构建的独特意义。构建集体记忆并非陈启文创作《大河上下》的根本目的,他所书写的“是黄河的

命运,而黄河的命运背后,也是人类的命运”,^[4]但惟有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构建,方能避免遗忘,从而唤起共同的危机意识,这也成为陈启文整部作品的内在机理。陈启文在《大河上下》的创作后记《面对黄河,惟有敬畏》中也说:“对江河的叙述是一种历史感和现场感很强的叙述,我对大河上下的追踪,最终都必须通过很多过来人的讲述来呈现,这也是我惯用的方式,通过一个个形形色色的个体叙述者,用他们各自的视角来呈现时空中的某个片段,从而构成一条大河、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4]

事实上,一部长达40万字的报告文学,如何去讲述一条大河,并通过这种讲述使这条作为一个民族母亲河的大河获得一种共同的认同,从而真正意义上成为一种集体记忆,这是有一定难度的。陈启文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创作经历的作家,不仅长于报告文学的创作,而且在各种体式的小说、散文的创作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巧。在这部报告文学中,陈启文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史料查阅等途径,融合新闻学、文学的手法,在现实与历史、理性与感性、事实描述与故事叙述的交替中,多视角勾勒了一幅兼具时空流转的、立体的人力与自然力纠缠前行的大河历史画卷。

前文我们说到,陈启文在实地调研中,通过点面结合的方式,从黄河上游溯流而下,构拟了黄河的整体画面,其主要意义在于确立了书写黄河历史的核心结构——即黄河的历史情态如何显现、通过哪些地方最能显现这一问题。报告文学不是绘图,而是以事实为依据对事实的深度报道。报告文学中的事实与新闻中的事实一样,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力所在。一些报告文学重于讲故事,却淡化了站在客观的角度陈述事实,往往偏离了对事实真相的深度挖掘,从而导致读者对其所持观点和态度的怀疑,影响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显现,甚至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陈启文要为黄河写史,那就要依据这些“点”揭开历史的面纱,而“要了解一段岁月,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追踪那段历史的见证者”。^{[2]27}所以,在《大河上下》的叙述视角上,除了贯穿全文始终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也即“报告人”,围绕选取的每一个点又适时地引入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者,这些叙述者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或历史的转述者。

讲故事和记录历史的差距在哪,或许《大河上下》能提供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作者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巧妙转换之间,完成了对不会开口说话的黄河历史情态的叙述。玛多究竟有多艰苦,那里的水文人究竟要面对怎样的艰辛,如果仅凭陈启文个人的一点体验,或许会受到许多质疑,乃至于网络“喷子”的谩骂,但谢会贵这个在海拔4 500米、人类生存极限条件的高原上独自坚守32年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正是谢会贵这样在生命禁区的黄河守望人见证了新中国黄河水文发展的一段深重历史。同样在与第一人称交互出现的第三人称叙述者还有王瑛局长、王进先老人、张姓老师傅、阎大爷、丁永林、东平湖工程局副局长曲福贞等等一大批人,他们或是转述某段历史,或是表达自己的某种想法,穿插于作者选取的每一个实地调研点调研情况的叙述之中。让当事人讲述所经历的事实,这是新闻写作中的基本技巧,《大河上下》中,陈启文在事实的陈述中,显然是深受新闻写作基本技巧的影响,又或许,陈启文是一个善于聆听的人。因而,在《大河上下》中,我们看到了一幕幕黄河的悲欢故事,而这写故事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个当事人残存的零星记忆,但在陈启文有序的组织之下,这些看似残存的个人记忆,绘制成了一段黄河的历史图谱,并且被深深地镌刻进了读者内心深处,化为一种能凝聚普遍共识的集体记忆。

当然,如果仅有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人的主观叙述,显然还是会受到质疑,仍然会削弱作品表达的力度,“报告文学在看取和反映生活时也只有采用多种视角、多种方法才可能接近生活的原貌”^[5]。作者显然很重视这一点,所以,陈启文先生如在完成一份科学报告一般,每走一处,除走访、观察之外,就是遍阅历史记述、档案资料,尽可能地将黄河的历史情态呈现出来,力图系统地讲述黄河的重大事件。也通过这种多视角的叙述方式,全面、广泛而丰富地对黄河历史情态形成了立体化的呈现。“面对黄河、惟有敬畏”^[4],也正是怀着这种敬畏之心,让我们得以重新认识黄河——“无论你现在栖身何处,也无论你是喝哪条河水长大的,每一个炎黄子孙、龙的传人,都无法割裂同黄河的联系,我们生命中的染色体都是黄的”。^{[2]9}

三 集体记忆构建下的悲情呐喊

一部黄河史,就是一部华夏民族的治河史。潜藏在民族记忆深处的黄河遥远的故事被《大河上下》一点点拉近了,但真正拉近之后,却发现这条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河流已经变得满目疮痍。“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对‘过去’在‘当下’的再现,必然涉及历史真实与现实利益的关系问题”。^[6]很显然,《大河上下》不仅要重构黄河的集体记忆、为黄河写史、立传,更是忧心忡忡的为黄河命运发出了悲情的呐喊。

“保护母亲河”,这在全中国已经呼号了20余年,然而,却鲜有人能真正回答为什么要救母亲河这一根本问题。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上下》在历史与现实、文明与科技、人与自然、功与过的追述中为我们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叙述。更为重要的在于,近十几年来,全球生态持续恶化、生态问题备受关注,中国国内洪涝、干旱及地质灾害频发的背景下,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当黄河成为一个悬念》《湘江,谁为你哭泣》《由远及近的黄河》《问卜洞庭》等作品持续关注水安全、水生态问题,就不再是对社会热点的简单回应,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的驱使。陈启文在《大河上下》的后记《面对黄河,惟有敬畏》中写道:“我书写的主题是黄河的命运,而黄河的命运背后,也是人类的命运。”^[4]但人类太善于遗忘,更在意的是当下,这看起来似乎正确的逻辑,却成为破坏自身生存空间仍不自知的根源。作品名为“大河上下”,某种程度上“上下”一词不仅内蕴着黄河水域的一脉相承,同样也隐喻着过去、现在甚至未来之间的因果关联。

面对黄河,惟有敬畏!溯流而下,当一个个历史片段被串接起来,一部黄河史、中华民族的治河史也变得清晰了起来,堵、疏、保这个耗尽千百年之力总结的治河良策,被不断地运用在九曲黄河的治理上,但我们也看到,当我们自得于一个个浩大的水利工程截河而起,感动于一代代黄河治河人殚精竭虑整治水患、造福天下苍生之时,作者并未给我们一个轻松而圆满结尾。这一点更多得益于作者采取的比较性叙述,付出与得到、功与过、得与失,几乎在黄河治理中同时上演,如作者在对“泥沙俱

下”的纠谬中,既得肯定黄河在流经河口镇到三门峡这片广袤的黄土高原时使得自己真正获得了“黄”的姓氏,甚至于,“若没有黄土高原,也许就没有华北平原,从塑造黄土高原到冲积出华北平原,是黄河最伟大的创造,而没有黄河,也许就没有中华民族”^{[2]17},但是年平均达16亿吨的输沙量又给黄河带来了一个灾难性的命运,河床不断被抬高,而导致的黄河决堤之水奔涌而出后的改道又有哪次不是给华夏大地留下了久久难以愈合的创伤。

即便是采取的堵、疏、保等措施,筑堤建坝、截流拦洪、引黄济津,又是否真正抵挡住了人类本身同时在进行着的破坏呢?陈启文由此而发出的慨叹发人深省——“当一种灾难被人们解决,另一种灾难又开始出现:黄河没水了,断流了”,^{[2]133}干涸的河床还在不断被抬得高出人们生产生活的地带,甚至很多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就像一把悬在城市上方的利剑,而更为严峻的还在于,黄河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远远不止于一条河流,它是华夏文明的代名词,因此,在作者看来:“对于中国人,拯救黄河,不止是拯救一条自然河流,更是对中华文明的拯救”,^{[2]135}这是为拯救中华文化发出的悲情呐喊。

稍为遗憾的是,作品结尾处将拯救黄河命运寄望于引长江水进黄河,这让本已掀起的反思与批判高潮骤然跌落,同时,与前文走访、调查中对黄河造成今日之局面的复杂性似乎形成某种悖论。在笔者看来,报告文学不能包打天下,既要深入揭露问题,还要提供解决问题的策略,文学家不是科学家,这或许不仅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会削弱作为文学本身的意义。再者,本作品所能产生的意义不仅止于黄河,而是指向人与自然的整体生态,生态文明观念不进步,生态文明建设不发展,黄河的命运恐怕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本身也是《大河上下》让我们共同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对人自身的反

思就不断成为了文学干预社会的一种表现方式,也催逼了生态主义在中国文学、文化,乃至科技思想、技术方面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目标之一,足见生态问题在当下的严峻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陈启文的大量报告文学、小说及散文写作,特别是持续而深入的生态写作,颇为沉重地表达了他对生态的忧虑,体现出他对社会发展敏锐的洞察力。水是生命之源,万物概莫能外,对水生态的忧虑,实际上是对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忧虑。

报告文学不是书斋里面的学问,是艺术,是社会学,也是一门科学,陈启文的《大河上下》在叙述样式、表达技巧上或许并无突出的新意,但他在近6年多的时间里,依赖数次深入采访、史料查阅后多角度对黄河历史情态的展示和叙述,构建并丰富了黄河的集体记忆,在对比和追问之中获得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性意义,某种程度上,这与近来学术界批评的文学创作的“浮躁”之风恰恰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创作或许也就是我们共同期待的“无愧于时代”的创作。

参考文献:

- [1] 梁志群. 新世纪报告文学:传承、突破与困扰[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
- [2] 陈启文. 大河上下[J]. 清明,2016(2).
- [3] 陶东风.“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J]. 文艺研究,2011(6):14.
- [4] 陈启文. 面对黄河,惟有敬畏[N]. 文艺报,2016-04-25(3).
- [5] 李炳银. 生活与文学凝聚的大山:对报告文学创作的阅读与理解[J]. 文学评论,1992(2):18.
- [6] 燕海鸣. 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 中国图书评论,2009(3):11.

责任编辑:黄声波